

思古楼访“两痴”先生

沈思扬

3月的温哥华还是雨季，定居那里多年的董存发叔叔驱车，带着我和朵云轩拍卖公司的彭芸芸总去拜访著名钱币收藏家、学者杜维善先生。

杜先生的家是一幢独栋的西式洋房，穿过花园的小铁门，我们敲响了房门。杜先生亲自开门，连连招呼我们进去，地上早已摆放好了拖鞋。进门右拐，杜先生引我们走进了他的书房“思古楼”。虽然之前在网上搜过照片，也在脑海中想象过他的形象，但是第一眼还是不禁感慨，杜先生和他父亲真的很像！那天，杜先生穿着件咖啡色的开衫外套，乍看起来有些严肃和距离感，但是有说有笑的交谈很快打破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他讲起话来有那么多像京剧念白，自带韵律感，别有韵味。杜先生的神情中透露着友善与亲切，举手投足神闲气定，让我们的这次拜访仿佛是听一位熟悉的长辈讲故事，只可惜一下午的时间实在太过短暂。

“两痴”先生

杜维善1933年出生于上海，他是杜家的第七子，母亲是杜月笙的四房太太，一代名伶姚玉兰。杜维善自小喜欢经史子集的老书，他的私塾先生陈微明在《思古楼记》中评价他“性醇谨，喜购置古字画……安知其将来不能博学而成名乎”。陈微明写这段话的时候，杜维善才十五岁。杜维善最喜欢的书斋名“思古楼”，正是源于陈微明的这篇《思古楼记》和其兄陈苍虬的《思古楼图》，杜维善的书斋一直都把这个名字。

思古楼里朴素而雅致，正中一个大书桌，壁上挂有字画和钱拓，南北两面满满当当地挂满了钱币。董叔叔一边熟门熟路地为我们端上了两杯茶，一边解释道：“杜先生很仔细，每次都会把茶头泡好，这是老法，这样客人来了以后这茶也已经‘开’了。”杜维善为我们泡的是他常喝的花茶，这是北方人的口味，随他的母亲，他的话也就从吃喝喝开始了。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杜维善说得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却独独不喜欢吃上海的东西。“我喜欢吃四川的口味，葱啊、蒜啊各种调料，味道足啊。”他对四川菜的情有独钟也许和他曾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有关。我戏称为“重口味”，引得他哈哈一笑，说“没错没错，重口味”。

杜维善和钱币结缘也与川菜有关。当时他还在台北工作，每天中午都会到北门邮局的二楼吃川菜，常常是一菜一汤两碗白饭。三楼是个古玩市场，有一天他吃完饭便上楼闲逛，正好看到一家古董店在卖汉五铢，他便问老板“这枚五铢是西汉还是东汉的？”老板说：“我分不出，你买回去自己研究就知道了。”杜维善真的就买了一枚回去，他与古钱半个多世纪的缘分也就从这枚五铢开始了。

杜维善的收藏是从清钱入门的，打好基础之后一点点往“上”走，最后就到了最难的两半。有意思的是，他最初在钱币界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收藏，而是因为他为了凑二十万买两枚半两，抵押了自己新买的房子。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他倒很享受，出于对“半两”的痴迷，后来他干脆就自称为“两痴”了。

“两痴”先生虽然痴迷于古钱，但是他的收藏心态很是随和。他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收藏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困难，但我始终相信收钱是缘分，有缘分这个东西到你手上了，如果没有缘分，这东西到你手上也留不住。”收藏家的收藏故事最为传奇有趣，杜维善也不例外，他细细地回忆道：“我有一次看到一个钱，它品相很差，但是有一个特点，字是倒过来的‘两半’，而不是‘半两’。那个钱要价500块港币，当时好的半两也就10块，所以我就没有买。后来我一个晚上没睡着觉。”说到这里，杜维善自己先笑了，收藏家对于心系之物的心思可想而知，“想想还是算了，明天去买吧，但是第二

天跑过去那钱已经卖掉了。过了两三年，我在一个旧货摊上，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钱。卖旧货的人根本不懂，开价100块，我马上给钱拿走了就走。”我们都乐了，他又赶紧慢地说：“这事儿就说明你要是不到这个缘分，就是买不到。”

收藏之外，杜维善更专注于研究。他始终认为：“珍贵的东西也许一辈子就只能收一个，但是你能看着它看，其他什么都不能做。我收藏的原则就是做系统研究，要研究就要去收普通的东西。曾经有人拿了很名贵的王莽钱币给我，被我拒绝了。这么珍贵的东西，再找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到我这，单独一个没有用，不能做研究。”同时，杜维善还反复强调，“研究钱币就必须先研究历史，不研究历史你没办法收钱，因为你看到钱不知道该收哪一个。”正是因为五十多年来全情投入的研究，从零开始的杜维善最终成就了今天在钱币收藏界不可撼动的地位。

“近期，我还在整理这些钱。有的从前断代是秦半两，但是现在我发现有的可能比秦早，之前的断代有问题。偶尔还会收一点儿海上丝绸之路的钱币。”谈到近期的收藏与研究，杜维善悠然自得。“是不是这些钱要被您收光啦？”他闻言开怀大笑，乐呵呵地摇摇头说：“那可收不光。”

慷慨捐赠

杜维善笑称，起初很多人听说他是收藏钱币的，都不相信，包括上海博物馆已故的马承源和汪庆正两位馆长。汪馆长曾毫不隐讳地对回故乡的杜先生说，他不相信杜家会有人玩这个东西。有一次，汪馆长请来了一批沪上的钱币专家准备要“考察”这位杜家公子。面对这个阵势，杜先生客客气气地说：“你们都是专家，我拿一点东西出来，你们讲讲看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后来，汪馆长很是感慨，“我原先以为这位杜先生是请人捉刀写的，没想到我反而给他回信了。”当时杜先生就和两位馆长约定了，以后他们有机会到香港，给他们看自己的收藏。后来，马馆长到香港看到了收藏的丝绸之路钱币，直呼眼界大开。

正所谓“打”不相识，自此杜维善和上海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1991年，杜维善和夫人谭端言首次向上博捐献了367枚萨珊王朝金银币，轰动藏界。杜维善还受邀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他书案背后挂的便是上海博物馆那年颁发的“兹聘请杜维善先生为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的聘书。而后杜维善与夫人又多次向上博捐赠丝绸之路古钱古币和中亚古国货币，总计四千多枚。杜维善说到这四千多枚钱币，很是自



豪，还风趣地说道：“那个展馆太小了，放不下，只展出了一小部分。”要知道之前上博仅有的一枚丝绸之路钱币，还是好不容易问新疆馆商调来的。这些珍贵的古钱币不仅填补了内地博物馆在该领域的收藏和研究空白，还让上博古币馆跃居国际领先地位。杜维善因此荣获了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特别贡献奖”。

这次拜访前，我专程去了一趟位于上海博物馆内的“杜维善、谭端言旧藏丝路古币专室”。专室空间有限，但从种类繁多，使用流通地域广阔，时代跨度极大的展品中，依然可以窥得杜先生捐献钱币之丰。幸得杜维善与夫人的慷慨捐赠，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些图案精美、风格鲜明并蕴含着多种文化内涵的丝路钱币。展览前言中的这句“杜维善先生二十多年来对丝路古国钱币的苦心搜求和潜心研究，使其成为这一领域中集收藏与研究于一身的名家”，道出了杜维善注重系统性研究的收藏理念。“您之前一直收中国古钱，为什么后来会去收丝绸之路的钱币呢？”杜维善的回答很简单：“我之前看了一篇夏鼐写的文章，觉得里面两张萨珊钱币的照片很漂亮，就开始收了。”当然，杜维善的收藏不会仅仅停留于钱币的“颜值”，很快他便投入到丝绸之路钱币的研究之中。可是这一研究就发现了问题，丝绸之路的钱币牵扯甚广，因此一收就得全部收。杜维善坦言，丝绸之路的钱币收藏和研究极为不易，不仅要满世界去买这些价格不菲的钱币，收回来后续光是钱币上那些死文字就够头疼的。“既然收得如此不容易，杜先生您为什么舍得捐掉呢？”想必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这个疑问，杜维善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上博要啊！”这一出乎意料的回答，让大家哈哈大笑。“问我要的人很多，只有上博敢拿啊。”杜维善特别为我们解释说：“老的上博原址是我父亲的银行中汇银行。当年我见马馆长的时候，还和他开玩笑说我收房租来了。”

杜维善捐这些钱币的时候，又被朋友们称为“神经病”。虽然那天杜维善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之后我在沪上著名报人郑重先生的《海上收藏世

家》一书中找到了答案。杜维善在给郑重的一封信中写道：“像我现在虽然身在异域，但心存故土，我认为我的收藏应该原封不动将来捐给上博，一方面物归原主，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后人利用我的收藏对我错误的地方作纠正研究。”这段话不仅露出了杜维善浓浓的思乡之情，也表达了他对推动丝路钱币研究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真正的研究者的开放心态。

情系故土

采访杜维善，总是绕不开他的父亲杜月笙。杜维善笑呵呵地说：“是啊，以前可是大流氓，黑社会头子。”我们都纷纷感叹杜维善和他父亲长得像，他又幽默地和我们开起了玩笑，说：“我跟姜文说，你以后要拍杜月笙的电影，我来做主角，都不用化妆的。就是你要再给我找个漂亮的太太。”

杜家家教甚是严格。杜维善告诉我们，因为父亲自己没有读过书，所以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当时在苏州读中学的杜维善考试拿了第一名，父亲便问他要什么奖励。他说想要一部《四库全书》，结果父亲就买了一整套来。“我很少和我父亲接触，吃饭吧，也不能和父亲坐在一个台子上。一般都是他先吃，我们再吃，或者是他坐在前面吃，我们在后面吃。”在杜维善的记忆中，他仅有一次和父亲同桌吃饭的经历，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请他一同上桌吃的。“为什么呀？您不是有点儿怕您父亲呀？”我很难理解这么做的原因。杜维善摆摆手说：“不是呀，这是我们的规矩，只有大哥大嫂可以坐，二哥什么的都轮不到。”

有人说到温哥华漫长的雨季可以把人憋出忧郁症，但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这恰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杜先生不喜欢应酬，极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醉心于自己的研究，能够拜访他真的非常难得。其实那天不难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谈话中总是伴着气喘和咳嗽。但他对我这个“小老乡”很是照顾——我的祖籍也是川沙。尽管有的问题可能回答过好几遍，有的问题稀奇古怪，他都很有耐心地一一作答。我这个“门外汉”也被他对古钱币的热爱深深感染了。

我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雨下得很大了。董叔叔特别提醒我们，记得住书房的窗户看，因为杜先生习惯站在窗口和客人道别。我一转头，果然看到杜先生站在那边笑眯眯地向我们挥手。我也向他挥手，一直到车子转弯看不到那栋小洋房为止。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坐在思古楼，听杜先生悠然地讲他那些讲不完的故事……

《世说新语·文学》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魏晋玄学大盛，注《庄》者不下二十家，窃以为如此读《庄》，可得哲人之心。齐桓公于堂上读书，轮扁曾云：“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大道无言，能言者，道之粗也。庄周著书，正是如知者忘言。

言及其所构成的文本体系，不过是“道”的勉强指向，且并非唯一或最佳。以“道”为目的，对读书不以为然，确也无可厚非。禅宗不也主张不立文字，棒喝顿悟么？阅人既夥，阅世既深，谓《庄子》“了不异人意”，不过是中年不惑而已。王阳明少读《礼记》及朱子，格竹七日，劳思致病，其后谪居贵州，于穷苦困顿中，方悟道不外求，转重朱子“学问根本在日用间”（《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答诸叔恭》）、“更当于日用之间为入之本者，深加省察”（《传习录下·朱子晚年定论·答林允之》）。所谓吾之大学在日用，而不必尽在于书也。阳明此后教人读书，“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传习录》上），以免死于章句。至颜元斋，耗竭一生心思精力，仍未于群经中觅得尧舜周孔之道，愤然曰“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扫天下之人才”（《四书正误》卷四）；更谓以往读书，犹如吞砒：“于途次间乡塾群读书声，便叹曰，可惜许多气力。但见人把笔作文字，便叹曰，可惜许多心思。但见场屋出入人群，便叹曰，可惜许多人才。故二三十年前，便见聪明有志人，便叹之多矣；近但见才器，便叹勿多读书。”（《朱子语类》）

前哲反思读书之弊，既有鉴于语言及其所结构之文本的局限性，更因他们认为道之体认，非经验与力行不可，还因读书非唯增善，亦且助恶……凡此，皆须作具体分析。古今攻书，即便言不尽意，总有部分可启后学，以免误入歧途；力行践履，也是印证及走入经典的有效方式。故其人反读书，如李白引“鲁史谈五经，白发成章句”（《嘲鲁儒》），是反死读书、读书死者。世间另有一种见识，以为为读书人叹词迂阔，百无一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焚书坑》），此种纯以事功、成败为价值判断的反智传统，与前哲见地南辕北辙，绝不相关。

盖读书之迂，有死读、读死之迂；也有守正持道、有所不为之迂。后者不能阿世取宠，更做不到诡辞其术、不渔利天下，乃读书真义所在，而为真哲所表彰。与读书之“迂”相对，曾有一种读书之“智”。朱维铮先生曾谓刘、项等是国史“不学无术”之人，此种“术”生长于社会生活，不必通过读书即可获得，正如清初颜、李学派的“道”，也不一定需要经由读书，“术”、“道”皆可由此外获得。先哲不排除读书亦可达“道”，学固亦可由读书通“术”，更可“道术以为天下裂”，以通“术”而感“道”。则刘、项等若读书，一样不妨“坑灰未冷山东乱”，且有过于之。此所谓更怕流氓有文化也。

故前哲反读书，乃鉴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针对读书非但不能明道修德，反而增人狡黠，败坏心术，包含了更深一层的忧虑。《庄子》此论极多，而以《胠篋》尤为痛切。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天下以‘道’，取天下及惑天下以‘术’，人之谓‘文明’者，在庄子看来，有多少却是‘文暗’、‘文惑’、‘文黠’。其云‘擢乱六律，铄绝五音，塞聪聩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真堪振聋发聩。后代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文明’者几何，‘文惑’者几何，‘文惑’而自以为‘文明’者几何，乃至‘文黠’者又几何！”

“文”本通“纹”，文即饰也，饰即伪也，人若无“文”，形同禽兽，而人之文明，又杂陈多少伪惑、淆乱、狡黠，此真人类无可奈何之宿命。阮籍《咏怀诗》（洪生资制度），那被服有常，举止得体的儒生，作为文明的产物与传人，在诗人看来，却“委曲周旋仪，姿态恣我随”。或许这还只是积习使然，无心之伪；又有一类，如《庄子·列御寇》篇中吮痂舐痔者，蚊附蝇趋，更无足论矣。阮籍亦尝被迫为人作《劝进表》，而内心愤郁，文成数月，即溘然长逝；若吮痂舐痔之辈，以文助恶，吞砒如饴，必无阮氏之痛。陶渊明才高学富，而五子皆不学，陶作《责子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

三年后的2006年冬天，江苏金坛建戴叔伦纪念馆，其后裔戴炳元先生等一批热心人，驱车千里来进贤楼山拜访先祖遗迹；并特别到我家，情真意切要求请走张中行撰并书的对联。如今想起此事，一晃已十余年过去了，但张中行先生撰并书赠的宏才与情，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这副嵌字联书写成九尺长联寄我（见右图）。又过了几个月，我再往北京，将该联出示鉴赏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两天里看了三遍，说：“张中行先生学问大，对联开头即巧妙地运用《论语》中的句子，后面的内容又包含了文天祥与戴叔伦两个人名及其故事，结合得趣味无穷又气象正大，书法亦上佳，好联好字，真真佩服。”

半年后，张先生将自己所创作的写。我当然知道，张先生对很多所谓的“书法家”看不上眼，但以他在京文化界的声望，不难请到合意的名家来写。不过我怕给他多添麻烦，连忙说：“不用，不用，既是先生撰联，也由先生书写最好。”

读书之迂与读书之智

李翰

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或谓渊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遣兴》），是很铁不成钢。而细味全诗，诸子不好纸笔，不爱文术，恰免吞砒之害，而得上树觅梨、提竿打栗之自然趣味，一派天真。诗题“责子”，而全篇洋溢溺爱之情，哪里有半分责备的意思。陶渊明质性自然，难容矫厉，五子不学，正可健康活泼地成长。

由读书、文籍之伪，转尚自然淳朴之真，正是文明自身的清创排毒。文明进程愈深入，其创毒也随之深入，在《儒林外史》中，吞砒之毒，几乎已不可救药，于是，最凶险的人物，便是那寄食寺院的写字人季遐年、做裁缝的荆元、卖火纸筒的王大、开茶馆的盖宽。且说裁缝荆元，也弹得琴，写得字，做得诗，有朋友就问他：“你既要去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向那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荆元回答：“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真是神仙一样的人物。那朋友听了这番话，也就和他来往了。

再如茶馆小老板盖宽，生意总不大好，日子捉襟见肘，邻居一老多时常住往，一日邀他顺便上雨花台绝顶看看，书中写道：“（两人）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两个人缓缓的下了山，进城回去。”二人风光霁月、清简洒脱的气象，与严监生、范举人等比起来，真如云泥。不过，这一幅斜阳悲歌的图景，透露着沉沉伤感，也令人胸闷。本回的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想那吴敬梓饱读诗书，主盟文酒，到头来却要居在儒林之外，去听那高山流水，悲夫。

天地有大美，为圣人之所法，法圣人，何如法圣人之所法。三千年圣贤华章，满世界头中碌碌，更为长久的，竟是那引车卖浆、渔歌樵唱，岂无由也。

从学校西门出来，每每见宏基广场烟火喧嚣，卖水果的，烤羊肉串的，挤大排档的，熙熙攘攘，不知其中可有荆元、盖宽这等人。转思古人之议论，回望楼宇之茫茫，不禁想，在西门口支炉烤串，可免吞砒否？



秋（寂寥）（油画）费迪南德·拉什斯卡 [立陶宛]

张中行为我作联

文先国

我几十年在地方从事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暇余喜欢对联与书法。好事的时候，我也会请师友撰写或书写对联，当然不少师友也会主动为之，让我欣喜不已。回忆起来，在读书写字“搞文化”的过程中，对联书法之笔墨情缘，还是很有意思的。

1996年，我在北京张中行先生府上聊天。记得当时我拿着一张进贤地图，和张先生讲家乡故事，谈到我们进贤一支文氏，元初徙自庐陵（今江西吉安），与文天祥同宗共祖；也谈到唐代诗人戴叔伦在我家杨坊湖南端隐居等。我请张先生为我撰一联，要嵌“进贤”与文天祥、戴叔伦的姓名、事迹。张先生沉吟酝酿，不出半小时，就按我冒昧之请，写出了一副对联：“进吾往也，青史标名

文信国；贤思齐焉，碧湖迺迹戴叔伦。”我见之大喜。当场领教了张先生的文采，我不禁想起比张先生小两岁的中央美院教授、书画家梁树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张中行先生的对联，无人可比。”果然名不虚传啊。张先生接着问我希望在北京找谁书

写。我当然知道，张先生对很多所谓的“书法家”看不上眼，但以他在京文化界的声望，不难请到合意的名家来写。不过我怕给他多添麻烦，连忙说：“不用，不用，既是先生撰联，也由先生书写最好。”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